

蘇聯醫師的道德

維諾格拉多夫著

徐長巖譯

苏联醫師的学

培养医务工作者先進的共產主义道德和人道主义精神是進一步改進我能力人民保健事業的最重要條件之一。

實質上这就意味着必須培养苏联人民的集体主义和國際主义精神，必須培养对作为改造世界的有力革命武器的劳动的社会主义态度，必須培养用社会主义的态度來对待社会主义財產、对待自己的職責和处理人与人之間的关系，必須用全心全意爱护和忠实於自己人民的愛國主义精神來教育苏联人民。

這些問題对全体苏联人民來說都是親切和明确的，很多人都把它看作是用不着加以証明的真理。

但是，大家知道，在資本主义國家中，千百万人，其中也包括許多医学界的代表人物，对道德的本質却抱有不同的观点和見解。

为了更深刻更全面地來揭發这些分歧，並明确地認識資產階級道德理論的反科学性和反动性，必須首先回答道德究竟是甚么這個問題。

道德，和哲学、政治、科学、艺术一样，是社会意識形式。为了使这个一般性的概念更明确起見，还应当补充說：道德是規定人們的行為和品行的、規定人与社会之間以及人和人之間关系的意識形式。

馬克思主义在歷史上第一次科学地解答了關於道德的起源、本質和發展的問題。

唯心主义哲学家过去曾經宣称社会生活条件是由人們道德的發展水平、人們的道德觀念來决定的，这也就是断言意識決定存在。

恰恰相反，馬克思主义所持的出發点是：社会意識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对物質生活条件來說，意識是第二性的。正因为这样，所以在一定程度內，社会意識落后於社会存在。斯大林曾經寫道：“物質方面的發展，存在的發展，先於精神方面的發展，先於觀念的發展。顯然，首先是外部条件發生变化，首先是物質發生变化，然

後意識和其他精神現象才相應地發生變化，——觀念方面的發展落後於物質條件的發展。”^①

資產階級的理論家是不願意也不可能相信這個真理的。他們在很多著作中企圖證明道德的準則和規範是不依賴於物質生活條件的。他們為意識捏造了某種“永恆的”和“不可動搖的”原則作為另一基礎，處心積慮地來割裂意識和存在的關係。應當着重指出，這種濫調並不是新的，它具有極其悠久的歷史，一直可以追溯到唯心主義哲學家蘇格拉底和柏拉圖的時代。例如，柏拉圖就曾經把道德和承認某種彼岸的超越感覺的概念聯繫起來，尤其是把道德和“善”的概念聯繫起來，他並且斷言與他同時代的貴族、世襲貴族具有最高尚的道德。

在道德的觀點上還存在着其他的嚴重的分歧。馬克思主義根據大量的事實認為道德的規範隨着時代改變，它們因不同階級的統治而不同，因社會結構和國家結構的不同而不同。恰恰相反，唯心主義觀點的代表人物卻認為道德屬於永恆範疇，在一切形式的國家中，在一切社會結構和一切時代中，都是相同的。例如，18世紀後半期德國唯心主義的創始人伊曼努爾·康德宣稱，人們的行為是由他們所固有的某種一向存在的內在力所決定的，這種內在力賦予人們的行為以道德意義。康德在掩飾階級利益和階級矛盾的同時，要求勞動人民恭順和馴服，他創立了某種好像是超越時間範疇、超越階級的一般道德。另一個德國唯心主義哲學家歐根·杜林也曾經寫過存在着“永恆的道德真理”。類似的觀點完全適合當代的、企圖使自己的統治萬世長存的剝削者的口味。但是，這種反動理論是和工人階級不相容的，是和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相矛盾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是根據具體的歷史條件來解釋道德的規律和準則的。

恩格斯在他的著名的、對杜林反科學的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觀點給予了致命批判的著作《反杜林論》中寫道：“……所有以往的道德理論，歸根到底都是當時社會的經濟狀況的產物。而且因為直到現在，社會總是在階級對立之中發展，所以道德總是階級

① 《斯大林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352頁。

的道德；它或者是为統治階級的統治和利益辯護，或者是当被压迫階級变得充分强大时，它就表现出对这个統治的反抗，來維護被压迫者的將來利益。”^①

恩格斯在同一著作中曾進一步強調指出，人們自覺地或不自觉地总是从自己的階級地位所奠基的实际关系中，也就是說从“進行生產与交換的經濟关系”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点。但是，恩格斯也曾經告誡我們要防止把馬克思主义的存在先於意識的原則庸俗化，他指出社会意識形式（道德也包括在內）归根到底只能是由当时社会的物質生活条件所產生。換句話說，生產方式不是直接地，而是間接地通过經濟的中介來規定作为社会意識形式的道德。而这些社会意識形式，例如藝術、政治、科学，也从自己的方面对道德的形成給予一定的影响。

馬克思列寧主义的原理並不認為作为社会意識形式的道德只是依賴於經濟，依賴於基礎，而对这个基礎不給予任何反作用。恰恰相反，道德和其他的上層建築的組成部分一起巩固着这个階級的統治和現存的基礎，“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巩固，採取一切办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旧基礎，旧階級”^②。

企圖千方百計地來模糊劳动人民意識的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从神的意旨引伸出道德的准則。他們宣稱，道德的准則是人类的本性所固有的，道德原則好像是奠基於人类“灵魂”之上似的。这一类的說教者並進一步地誣蔑共產主义道德是一种謊話，誹謗苏联人民摒棄一切道德。

列寧在共青团第三次全國代表太会上所作的著名演說中揭穿了这种处心積慮的惡毒的誣蔑。他說：“究竟有沒有共產主义道德呢？有沒有共產主义德性呢？当然是有的。”^③ 列寧教導我們說，共產主义道德是建立在为巩固和建成共產主义社会的斗争的基礎之上的。我們的道德是服務於無產階級的階級斗争利益的，並且是从这个斗争的利益中引伸出來的。列寧对苏联青年說：“擺

① 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 1956 年版，第 96 頁。（譯文參照英譯本略加變動。——譯者）

② 斯大林：《馬克思主义和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 1953 年版，第 3 頁。

③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54 年版，第 807 頁。

在你們面前的是建設任務，你們只有通曉了一切現代知識，善於把共產主義從背得爛熟的現成公式、意見、方案、章程和綱領變成為包括有你們的直接工作的活生生的東西，把共產主義變成為你們實際工作的南針，那時才能完成這個任務。”^① 他還說：青年一代“……只有把自己的學習、教育和訓練中的每一步驟同無產者勞動者反對舊的剝削者社會所不斷進行的鬥爭聯繫起來，才能學習共產主義”^②。

根據列寧的這些指示，我們可以得出這樣的定義，即共產主義道德是積極地和自覺地建設新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人們的行為準則和規範的總和。

一直到今天還時常有人發表這樣的議論，即認為共產主義道德和資產階級道德的不同處好像只是在於共產主義道德比資產階級道德要高尚一些。其實再也沒有比這種議論更幼稚更荒唐的了。從科學的見地來理解這個問題就會知道，建立在“人吃人”制度基礎之上的資產階級的腐朽道德是和真正的道德沒有絲毫共同之處的。讓我們拿例子來說明這一點。從資產階級的道德觀點看來，私有財產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但是，無產階級在採取了革命手段把政權掌握在自己手裏的同時，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的社會所有制代替了私人所有制，無產階級把自己的這種行動看作是合乎真正道德的。

在這樣的情況下，究竟怎樣的道德才是正確的呢？我們對建立在掌握現代社會發展客觀規律基礎之上的無產階級道德的真正科學性和真實性，對建立在生產工具和生產資料私有制遲早必然會被社會所有制（這種所有制必然要消滅人剝削人現象）代替的確定不移的規律基礎之上的無產階級道德的真正科學性和真實性，是不能有所懷疑的。

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教導他們的后繼者和學生們不能局限於僅僅用人剝削人的道義譴責來批判資本主義制度，而是要將這樣的批判導向邏輯的結論，也就是說，要揭示資本主義發展的客觀規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06頁。

② 同上，第810頁。

律，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性。这样的社会发展前途的知识曾经鼓舞了工人阶级，曾经激发了他们的道德勇气，淬砺了他们的道德意志。

总结起来，在目前阶级对立的世界中存在着两种道德：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和与它对立的、敌对的资产阶级道德。

资产阶级道德的特点

前面已经谈到过，根据恩格斯所下的定义，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从生产关系（在其中进行着生产和交换）中汲取自己的道德观点。

资产阶级道德奠基在资本主义的关系上，并且反映出这种制度的全部丑恶。资本主义从精神上糟蹋着人，毒害着人的意识，使得发展到极端的自私自利成为资产阶级道德的主要“原则”之一。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之所以变成令人痛恨的个人主义者，并不是由于人们的特性所使然，而是由于处在生存条件的压力之下的结果。

列宁指出，在资产阶级社会中，“不是你去掠夺别人，便是别人来掠夺你；不是你替别人工作，便是别人替你工作；你或是当一个奴隶主，或是当一个奴隶。显然，凡是在这个社会里教养出的人，可以说从吃奶的时候就染上了这样一种心理，习惯和观点——不是当奴隶主，就是当奴隶，或者是当一个小私有者，小职员，小官僚，知识分子，总之是当一个只关心自己而不顾及旁人的”^①。

因此，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作为一个人是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路的——或者是成为剥削者，或者是自己遭受剥削。

“既然我是这块土地上的主人翁，旁人的事与我全不相干；如果旁人挨饿，那就更好，我可按更高的价钱出卖我的粮食。既然我有了一个医生、工程师、教员或职员的小职位，那末，旁人的事也就与我完全无关了。也许，只要我献媚取悦于有财有势的人，我就能保住我的这个位置，并且还可以高升到资产者的地位上去

^① 《列宁文选》，两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0页。

哩。”^①

在資本主義制度之下，人們懷抱着鄙陋庸俗的希望，不惜任何代價，不擇任何手段，為自己在資本主義的穹窿下攫取一塊地盤，他們不由自主地要使自己的道德法典適應於這種吞食一切的目的。

在高爾基的小說《福瑪·高捷耶夫》中，商人麥雅金說道：“親愛的福瑪，生活是很簡單的，要么你去咬人，要么你去躺在泥污里。”

蕭伯納所寫的劇本《巴巴拉少校》中的一位主人公軍火商人恩德夏夫特曾這樣地說出他自己的發財經歷：“當我還沒有立下誓要成為一個有錢的自由的人以前，當我還沒有立下誓說除了槍彈以外無論是理智的思考，無論是道德還是別人的死活都不能阻擋我之前，我挨過餓，我苦思過。我對周圍的人說：‘在我餓死之前，你們得先餓死！’這句話使我變得更自由更堅強。當我還沒有達到我的目的之前，我是一個危險的人，現在我却是社會上有用的人，一個寬宏大量的、仁慈的紳士。”

如果以為這樣的風習只是18世紀和19世紀的特點，在現代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已經絕跡，那就錯了。這些“仁慈的紳士們”正在煽起戰爭狂熱，準備原子戰爭，在歐洲和亞洲挑撥武裝衝突。

這種和我們格格不入的道德的另一特點是永無滿足的貪婪。金錢、財富統治着人們的頭腦，支配着人們的行動，扼殺了一切原則。

符拉基米爾·馬雅可夫斯基從美國這個“被上帝祝福的”資產階級民主國家回到蘇聯以後曾寫道：“在美國，你怎樣賺得百萬財富，這是不關重要的。一切都是‘生意’，生意就是能夠增加美金收入的一切。賣詩獲利是生意，偷盜，只要不被抓住，也是生意。”

資本主義甚至把人的健康也變成了商品，變成了買賣和欺詐投機的对象。凡是在病人和醫生之間的關係是建築在生意經的基礎上的地方，就不可避免地要產生利益針鋒相對的矛盾。病人希望儘早地出院，少花一些治療和藥品的費用；正好相反，治療時間

① 《列寧文選》，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0頁。

久一些，病人痊愈的时间拖得長一些，和藥剂师勾結一气开寫一些复雜而又昂貴的藥方好讓藥剂师为他招徠更多的病人，这一些对医生都是有利的。

利用着人們追求健康的自然願望，帶着医务証明和沒有証明的一些騙子手們在市場里傾銷着各种各样的所謂能治療特种疾病和包治百病的万应灵藥、“新藥”、“驗方”、“奇效藥”。受騙和認識不清的城市居民，尤其是乡村的人，在得了病时，很想把自己少數的錢用得恰当而又能早日恢复健康，但却不知道相信誰才好。他相信了廣告，这便像魚兒上鈎似地投進了以“生意”为唯一目的的人的怀抱。

这种市場医学在美國特別盛行，在那里有成千的不学無術的人通过無線电、报纸、雜誌，总而言之，通过万能的金錢，大肆吹嘘着自己的“最新的”治病方法来治病。因此，几乎在一切資本主义國家中，劳动人民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均在增高，这并不是偶然的。

在美國，这种游方郎中並不是自發地流行起來的，而是由政府机关加意培植和得到特別庇护的。例如，美國医学会誌曾經报道，在美國有1,700人在按脊術士(chiropractor)学校(埃阿華州达文頗得市)學習。他們(和一切其他学校的学生不同)每年每人得到政府500美元的補助。在美國总共有10万以上正式開業的按脊術士、按骨術士(osteopath, 靠槌打脊椎骨來“治病”的人)、自然療法術士(naturopath, 用草类“治病”的人)等等。

鼓励和推廣游方郎中的作法就是有意識地、主要是在劳动人民之中培植愚昧的表現之一。

天才，原則，見解，甚至於情感和愛情——这一切，都是資本主义社会里買賣的对象。不論是哪一种買賣，只要能獲得利潤，都會得到資產階級道德的鼓勵，甚至在任何情況下都不会受到資產階級道德的譴責。

远在資本主义發展的初期，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經看透了資本主义社会“精神”生活的这种丑惡特点，他們忿激地在《共產党宣言》中寫下了这样的詞句：資產階級使人与人之间，除了亦条亦的利害关系与冷酷的現金交易以外，再沒有甚么別的关系了。

金錢，這就是資本主義社會中人類尊嚴的主要的和唯一的尺度。假如一個人有很多的金錢，那末他就可以說：“我雖然丑，但我能買到最美麗的妻子，這也就是說我並不丑了，因為丑惡和可憎都被金錢化為烏有了。縱令我——在個人方面——是一個癩子，然而金錢可以供給給我 24 條腿，因而我就不再是癩子了；我是一個罪惡的、不忠實的、沒有良心的笨蛋，但是金錢却是受尊敬的，這就是說有錢的人也要被尊敬。金錢就是最高尚的美德，這就是說金錢的所有者也是善良的；除此而外，金錢還可以使我不必從事不老實的勞動；這當然也就可以設想我是老實人了。”^①

自從這些揭發性的文句寫出了以來，幾十年已經過去了；但是被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資產階級道德的膿瘡並沒有結疤。資本仍然從頭到腳，自它的一切毛孔里，繼續不斷地滲出血污和髒垢。現今的美國流傳着這樣一句話：“假如你由於飢餓而偷了一塊麵包，你將會坐牢，但是你若竊據了鐵路，你就会被選作參議員。”這並不是偶然的。

巴爾扎克在他的巨著《人間喜劇》中，用無比的洞察力量和藝術上的鮮明筆調，揭穿了資產階級道德的不顧原則、不擇手段、奸詐取巧和厚顏無恥。

巴爾扎克的小說《勾利尤老头子》中的主人公沃特連^②對大學生拉斯丁雅克說道：“親愛的朋友，我還要給你一個忠告：鄙棄你的信念，唾棄你的諾言。當需要的時候出賣它們。誰要是吹噓信仰是不可動搖的，誰要是把隨時都要正道而行作為自己的義務，那他就會是一個自信完全正確的大傻瓜。沒有原則，有的只是事實，沒有法律，有的只是情勢；那些出人頭地的人就是順應着情勢和事實來驅使它們。”

美國鐵路大王古爾達的一部傳記中寫道：“他的每一元錢都是由欺詐、賄賂、舞弊和偷竊而得來的。”

美國參議員衛斯特在談到他的同事和同胞們的情形時說道：“當他們談話時，他們是在撒謊；當他們沉默時，他們是在偷竊。”他

① 馬克思和恩格斯：《論藝術》，蘇聯“藝術”出版社 1937 年版，第 68 頁。

② 一個越獄的囚徒。——譯者

這樣的說法是不錯的。

資產階級道德腐蝕着人們，使人們養成嗜殺、沈溺於暴力的殘忍獸性。

在資本主義國家，首先是在美國，所培植的野蠻的暴虐狂和流氓行為，對我們蘇聯人民說來，有時是不能理解的。西德報紙上充滿了由於佔領軍“解悶散心”而每天釀成的罪案的消息。在卡爾斯魯爾市，一個美國兵開鎗打死了他所不喜歡的一個叫做彼得·克列恩金斯特的十歲德國小孩。在奧特爾布魯赫，美國兵為了搶劫出租汽車司機威廉·哈克列而把他打得半死。在卡色爾斯拉烏特烈，兩個美軍為了強姦婦女，毫無理由地把工人盧德威格·羅布痛毆了一頓。

在美國，強盜流氓的風氣和仇視人類的道德，不僅廣泛地在成年人的頭腦中培植起來，就是青年人、甚至兒童也都受到了深重的毒害。美國戰爭販子們，像希特勒匪幫一樣，企圖從少年時期起就把人們培養成劊子手。而學者們——帝國主義者的走卒們——則企圖從科學的見地來“論証”這種“訓練”的必要性。

按照馬歇爾將軍的訓示，有一個精神病醫生伊·迪·庫克為了要確定美軍中精神病激劇增加的原因，曾經在美軍中進行過調查。在“深入地”研究之後，庫克得出的結論是：大批的神經病的主要原因是由於“教育不良”。

庫克寫道：“20年來，我們的年青一代一再地被教導着說，一切戰爭都是罪惡。在學校里，在家庭中，都是同樣的話題。不要戰爭！不應當殺人！但突然之間，他們出乎意外地被征召入伍，也就是說他們變成了兵士，他們將要殺人。”結論是很清楚的：應當從兒童時代起就訓練他們殺人，應當使教育和道德適應帝國主義的罪惡目的。

如今充扮着仇視人類和吃人生番的野蠻思想的傳布者的，不只有職業軍人，不只有神甫，而且還有美國青年的教師。

美國的一個大學校長南士曾經講過：“我認為，我們必須根掘強權法則進行全面訓練。每一個人都必須學會殺人的藝術。我不以為戰爭應當限於陸、海、空軍，或在殺人的武器和方法上加以任

何限制。我贊成細菌戰，我贊成使用毒氣、原子彈、氫彈和洲際導彈。我並不要求對醫院、教堂、學校或任何居民區採取任何顧惜態度。”

美國《泰晤士先驅報》在1949年7月曾經厚顏無恥地寫道：“我們應當出動載有原子彈和細菌彈的飛機……以便把在搖籃里的嬰兒、正在祈禱的老太婆和正在工作的男子漢都炸死。”

我們在讀過這些文句以後，對於英國蒙哥馬利元帥所說的、新的戰爭“將是我們的真正節日，我們在新的戰爭中將要屠殺無數的人”這句話將絲毫不会感到驚訝。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經引用杜林所引証的話來說明這個問題：

“資本害怕無利可圖或利潤太少，正像自然害怕真空一樣。但一有相當的利潤，資本就會胆大起來。要是能保證百分之十的利潤，資本就會同意無孔不入；有百分之二十的利潤，資本就會生氣勃勃勇氣百倍；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資本就會冒險蠢動，雖然打破自己的腦袋也在所不惜；利潤達到百分之百，則人間的一切法律它都不會放在眼內；利潤達到百分之三百，它就敢幹任何勾當，甚至不惜冒絞刑的危險。”^①

資產階級道德依據着最反動的、最野蠻的虛偽“理論”來為各民族人民之間的戰爭進行辯護。

在美國、英國、意大利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中，廣泛地流行着所謂語文哲學的、實用主義的、各形各色煩瑣哲學的、弗洛伊德派心理學的以及其他“學說”的追隨者的極端主觀主義的觀點。他們異口同聲地斷言：世界上並沒有客觀發展規律存在；這樣的規律是不可知的；人類的創造性活動完全是由盲目的本能所支配的，完全是由隱蔽的、沒有得到滿足的性慾來支配的。

在大量出版的、載有下流的觸目的圖畫和駭人聽聞的標題的滑稽故事中，宣揚着屠殺、戰爭、搶劫、強姦和其他暴虐狂的“開心事”。兒童故事作家羅阿里德·達里在他所寫的《永遠不會有的一天》中濡染着新的世界大戰的“美妙風光”，好似人類自相殘殺

① 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蘇聯國立政治書籍出版社1949年版，第764頁。

完全符合生物学上的要求。这里以吃人者的怙恶不悛和放肆的嘴臉斷言，屠殺人民和消滅一堆螞蟥一樣，是極其平常的事。

在美國，作為國家的官方思想體系的種族主義，就是以這一切理論作為基礎的。

種族主義的實質是甚麼呢？它的實質就在於企圖用生物學的規律來說明社會現象，把社會的歷史看作是“種族鬥爭”的歷史。種族主義者們認為任何社會進程都是事先由生物學規律所制約的。他們妄圖證明勞動群眾天生下來就是低劣的。他們還妄圖證明國家和階級是和種族一致的，不屬於社會歷史的範疇。

這種卑鄙毒辣的謊言，已完全被馬克思列寧主義科學和全部社會發展史所否定。我們深深地知道，把自然規律和社會發展規律等同起來，用生物學的規律來說明社會進程的社會規律，不是別的，正是為了剝削階級的利益而傳播着的種族主義的反科學的捏造。**我們知道，人類精神上的財富是由人類生存的社會條件所決定的，並不是由種族因素，並不是由生物學特征來決定的。**

資產階級道德妄圖將帝國主義者把軍隊訓練成為天生的劊子手的心計放置在“科學基礎”之上，在沒有絲毫放鬆任何仇視人類的罪行的同時，它又滾入了優生學和馬爾薩斯學說的泥淖里。

優生學的創始人、英國種族人類學家弗蘭西斯·高爾敦宣稱，似乎只有貴族和資產階級才具有高貴的遺傳素質。根據特殊的“生物學”的統計，高爾敦妄圖証實自己的說法，好似勞動人民天生下來就是有缺陷的。為了提高“優秀人種”的繁殖能力，他建議用人工的方法來選擇配偶。

高爾敦的虔誠弟子之一、英國唯心主義者查理·皮爾遜在他所寫的《科學津逮》一書中，把他的老師的思想表露無遺：他建議把“劣等人種相對地或絕對地絕種”。

另外一種仇視人類的學派——馬爾薩斯學說——是由生活在18世紀和19世紀之交的英國神甫馬爾薩斯所創立的。這個反动透頂的分子認為，飢荒、瘟疫、貧困、失業以及人類的其他災難好似是由於地球上的人口是按幾何級數(1, 2, 4, 8, 16……)增殖而同時生活資料則是按算術級數(1, 2, 3, 4, 5……)增加的原因造成的。根

据他的意見來說，任何社会措施都不能消除这种脫節現象。“潔化”社会的唯一办法就是减少人口。

馬爾薩斯把飢荒、瘟疫、死亡看作是人間的幸事，因為它們消除了千百万“过剩的”人口；他把戰爭中大規模的屠殺称作是“上帝所嘉許的事”。

現代的資產階級哲学复活了馬爾薩斯的理論，企圖用它來作为反对劳动人民的武器，利用它來作为从道德上來論証辯护帝国主义侵略野心的工具。

美國新馬爾薩斯主义者威廉·伏格特公开地宣揚着用戰爭和瘟疫來消滅“劣等民族”的思想。伏格特滅絕人性地宣称：“从整个人类的观点來說，中國的飢荒也許不僅是值得欢迎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伏格特在另一个地方寫道：“医生們为一个目的集中了自己的一切力量——挽救人們的死亡。……在改善醫療設施和衛生条件的同时，他們担负着延長千百万窮人寿命的任务。”按他的意見，既然窮人和飢餓的人都是生物学上低劣的有缺陷的人，那末就应当廣泛地消除他們的生殖機能，甚至应当为消除生殖機能而設置“獎金”。

馬爾薩斯主义者罗伯特·庫克提倡通过強制性地消除妇女的生殖機能的办法來限制生育。根据庫克的說法，除了原子彈以外，無節制的生育是目前世界上最可怕的力量。

魏斯曼摩尔根主义也是反动的、敌視真正科学和共產主义道德的、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理論”。

这个在我國已經被徹底揭露了的流派的追隨者們断言，人們的道德品質、道德規範和智力都是事先而且永远不变地由“遺傳性”所支配的。既然“基因”是永恆不变的，那末“高級基因”的所有者便天生注定地应当統治具有“下等基因的人”。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就是这样地巩固了种族主义的“科学”基礎。

由类似这种吃人生番的“理論”所武裝起來的美國反动政客之一比尔波曾經大吹大擂地这样說過：“上帝在事前就把人类分成各种不同的种族。……我們清楚地知道，几千年來都像現在一样，

人种被分着白种、黄种和黑种三种主要的种族。……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黑种人从来也没有被赋予平等的权利。……”美国的另一个马尔萨斯主义者、参议员爱尔伯特·汤玛斯也曾经武断地说过，战争“正如同圣经一样是构成美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英国的一个极端反动分子亚瑟·凯依斯也怀着类似的意图发表谬论，他认为和平生活“腐蚀了人们的灵魂”，而“消除战争则是科学死亡的第一个征象”。

可惜的是，资本主义国家中的一些医生们和医学学者们也积极地参与了所有这一切指向于毒害人类、毒害人类健康和生活的罪恶活动。他们出卖了自己的知识和良心来换取高额的薪金和可耻的舒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那个时代中对马尔萨斯学说给予了致命的批判，他们指出这种“学说”的结论是为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他们指出反动分子马尔萨斯为了要博得主子的欢心而“捏造科学”。衰颓的、阻碍现代社会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制度才是劳动群众遭受灾难的真正原因。

资产阶级道德宣扬着民族主义、沙文主义，它妄图用种族和宗教的敌对来篡夺阶级斗争，它企图在不同民族、宗教和种族的劳动大众之间嵌进一个楔子来阻碍他们的团结。

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不同宗教的传教士和科学的捏造者沆瀣一气狼狽为奸。

在神的意旨的幌子下，他们挑拨对异族人民的敌视。他们引证圣经说：“不要和他们结成同盟也不要怜惜他们，不要把你的女儿嫁给他的儿子，你的儿子也不要娶他的女儿作妻子。……要这样对付他们：捣毁他们的祭坛，打倒他们的神幡，砍掉他们的树篱，焚毁他们的神像；因为你是神的子民：你是神所选定的，你是地上万族之中神自己的族人。”

传教士们用荒诞的“在神前平等”的原则来暗中替换一切人都是平等的革命的学说，他们伪善地叫嚷着说“在神前没有甚么富人和穷人：一切人都是兄弟”。当这些神甫们觉察到资本主义国家中千百万劳动人民向往于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他们就赶忙把

基督^①裝扮成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者，同时他們却並沒有忘記要提醒这一点，那就是基督是主張“以德报怨”、睡面自干的。他們按着福音書上的基督教的道德公式这样念着：“愛你們的仇敵，祝福那些咒詛你們的人，憐憫那些怀恨你們的人；你們要為欺負你們、压迫你們的人祈禱。”

資產階級道德妄圖把世事無常的思想，把對於塵世的一切苦難必須恭順忍受才能享受“死后的永恒幸福”的思想，灌注到劳动人民的頭腦中去。

基督教、犹太教、佛教、伊斯蘭教以及其他宗教的傳教士們，用各种不同的語言反復地訴說着靈魂不滅的鬼話，而為了使得靈魂不滅就应当恭順馴良，因為“塵世的生活只不過是一場夢幻，來世的生活才是虔誠信徒們的莫大幸福”。

列寧揭穿了這種說教的真髓。他說道：“一切的和任何的压迫階級，為要保護自己的統治，都需要兩種社會職能：一種是劊子手的職能，一種是牧師的職能。劊子手應當鎮壓被压迫者的反抗和騷擾，牧師應當向被压迫者描寫出在階級統治保存之下，困苦和犧牲減輕的前途（這是特別方便做的事，因為這種前途是否‘可以實現’，是不必担保的），这样就使被压迫者容忍階級統治，使他們放棄革命行動，消滅他們的革命情緒，破壞他們的革命決心。”^②

“新社会主义者”的宣傳和神甫們的旨在反對階級鬥爭的麻醉劳动人民的說教，一唱一和地相互呼應着。這些“新社会主义者”們宣稱應當修正“陳腐的社会主义理論”，號召停止一切謀求解放的鬥爭，號召要專門注意教育問題，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消除社會上的不平等現象。

可見，很顯然，資產階級道德麻醉着無產階級的階級覺悟，它是剝削者的道德，而剝削者的目的就是要採取一切手段來永遠保持自己的統治，宗教就正是適應這個目的的。

馬克思在揭露基督教的階級本質時曾經寫道：“基督教的社會原則曾經為古代的奴隸制度作過辯護，曾經讚揚過中世紀的農

① 耶耶蘇。——譯者

② 《列寧文集》，第4冊，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77頁。

奴制，而且在必要时它还会，虽然是装着一副假慈悲的面孔，來维护对無產階級的压迫……

基督教的社会原則把在地面上所遭受到的一切屈辱轉移到天堂中去补偿，这样一來就为在地上繼續干这些勾当進行了辯护。”^①

資產階級道德教人們鄙視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資產階級道德和基督教一样，把劳动看作是“下等”人的注定命运，看作是由於人类始祖亞当犯下的罪过而受的惩罚。傳教士們許諾着說：“一面祈禱一面忠順地劳动就能够拯救灵魂。”他們用这样的鬼話來安慰和欺騙被資本家奴役的人民，似乎这种奴役是“必須这样的，正是神所要求的，地上的不平等將來在天堂里就要消除”。

英國作家柏特隆·罗素在他所寫的一本書中这样地來描述未來的、按照“幸运的美國明星”所指引的社会的“理想”：“在这种社会中，將很少有智力低下的人。某些种类的工作很可能会完全由黑人來担任。……至於一般地談到体力劳动工人，那末和智力劳动比較起來，体力劳动和耐性更適合於他們些”。

在犹太作家斯法托普魯克的小說《巴特制度》中，談到一个資產階級吸血鬼、制鞋工厂老板巴特，他向工厂医生提出了这样的一个任务：“我要求我的工人在工作日的時間里不吃东西。要使他們有这样的一种肚子，使得在肚子里能容下一整天所需要的食物，像汽車一样裝着能够中途不停地开到應該到的地方去那样多的汽油。工人在工厂里吃东西、喝水都是不允許的。打开飯包，咬食物、咀嚼食物——所有这一切动作，都要花費時間，耗費思索和腦筋，所有这一切都要耗費金錢，而这些消耗对工人的灵巧、勤奋、速度、刻苦、生產率都是有損的，对公司的收入都是有損的！自动傳遞帶不需要吃东西，在傳遞帶旁边的人就是它的輪子、轉軸、引帶和齒輪，他們無論如何都不能离开它。”

資產階級道德使人們養成个人主义，使人們不團結，使人們厭棄集体行动。

資產階級政治家和为資本主义服务的學者們，力求証明人类

^①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5卷，1929年俄文版，第173頁。

的行动和思想的最強大的推动力似乎是个人的利益。

他們悄悄地嘟囔着說，虽然每个人只是追求着个人的快乐和滿足，但結果却是这样：因为我的快乐是我的幸福，你的快乐是你的幸福，他的快乐是他的幸福，所以我的快乐加上你的快乐再加上他的快乐就成了我的幸福、你的幸福和他的幸福……，也就是說这就是大家共同的幸福。

当然，类似的言論只是打算用來模糊人民的意識，只是打算用來欺騙人民。为了造成下面的这样一种錯覺这些言論是必需的，那就是由於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一致，人們只要嚴格地維護自己的、狹隘的、自私自利的利益就够了，这样就会自發地維護了整个社会的利益。

資產階級的學者們为了把个人和社会之間的关系这样一个鮮明的问题搞得模糊起來，他們從來也沒有放过任何一种詭計和歪曲。

在美國和歐洲的成千上万的教堂里，披着法衣和袈裟的傳教士們告誡着他們的信徒說，在我們这个罪孽深重的世界里，“每人為自己，上帝為大家”。

这一切庸俗的、徹頭徹尾的个人主义的哲学，是被捏造出來以阻止工人階級联合起來为反对剝削者而共同斗争。

資產階級道德是徹底虛偽和口是心非的。資產階級道德的准则只是劳动群众所必須遵守的。这种腐朽道德的立法者們本身却完全用不着承担任何道德义务。

高尔基在他寫的著名的諷刺性的文章《道德的祭司》中寫道：“你告訴我們大家說不許偷盜，因为如果别人偷了你的东西你会感到很难过，你不是这样說的么？但是就在你說這話的时候，虽然你有的是錢，你却忍不住还想偷得更多一些。……你嚴格地遵守着不許殺人的誠律。因为生命对你是很寶貴的，你的生活很愜意，很舒服。但是突然之間你的煤礦的工人要求增加工資了。你就不由地叫來了軍隊，而且响起了槍聲，几十个工人就这样被打死了。”

資本家通过他們的忠順的奴才——傳教士們反復地用这样的一些不可動搖的誠律來告誡劳动人民，例如“不許偷盜”，“不許殺